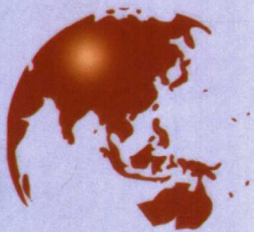


吴怀友/著

全球化与 中国共产党 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QUANQIUHUA YU ZHONGGUO GONGCHANDANG ZHIZHENG NENGLI JIANSHE YANJIU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湖南省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湖南科技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 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吴怀友 /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研究/吴怀友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7-5035-3637-3

I. 全… II. 吴… III. 国际化-影响-中国共产党-执
政-党的建设-研究 IV. 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9828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印张: 10.625

字数: 268 千字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导 言 /1

- 一 选题的意义 /1
- 二 文献综述/9
- 三 研究方法/30
- 四 框架结构和主要观点/37

第一章 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43

- 一 克服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44
- 二 健全与全球市场相协调的经济法律信用体系，增强规范市场秩序的能力/53
- 三 实施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计划，增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73

第二章 适应全球政治发展要求，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95

- 一 适应全球政治发展要求，提升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型政治体制的能力/98
- 二 适应全球政治法制化趋势，提升依法执政的能力/108
- 三 顺应全球政治民主化潮流，提升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126

第三章 把握文化全球化动态，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147

- 一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问题，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能力/150
- 二 积极适应文化全球化发展要求，提高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的能力/170

- 三 大力建设“三个面向”的文化，提高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187

第四章 深化对全球社会认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204

- 一 全面认识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培育对公民社会的引导和规范能力/206
- 二 深化对全球风险社会的认识，增强抵御和防范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231

第五章 倡导全球外交理念，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257

- 一 坚持用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增强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的能力/260
- 二 坚持和平外交路线，提高掌握处理国际事务主动权的能力/280
- 三 积极参与全球性事务，提升形塑良好世界大国形象的能力/297

结 语 深化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研究的 · 几点思考/316

参考文献/321

作者相关研究论文要目/334

后 记/336

导 言

一、选题的意义

全球化、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都是时代发展提出的崭新课题，把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开拓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研究的新视域。它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紧迫性认识，而且对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内涵，在全球化实践中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全球化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的、广泛的、现实的实践运动，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人类交往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于 20 世纪末发生了质的飞跃，所以，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①。全球化不仅深刻作用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法律、军事及人类生活，而且广泛影响世界各国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及其建设。对于全球化的后发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及执政党的能力建设来说，全球化的影响和作用尤为显著，这首先表现在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时代课题和严峻考验。

第一，中国共产党如何适应执政环境的全球性变革。我们

^① 李惠斌：《全球化：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知道，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主要限于国内，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战略指导下，虽然对外也有一些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但主要是关起门来搞建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文化、社会生活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影响、作用甚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执政活动越出了国家边界，空前扩大，从而具有复杂的国际性、全球性。一国范围内发生的任何事件、一国政府制定和采取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会对全球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的影响。

第二，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国内经济建设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全球化首要的表现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是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① 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全球性流动和优化组合，生产、贸易、金融活动日益世界化，使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出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一国的资源、市场、生产和贸易等全部经济活动已经不再纯属单个国家内部的事情，而是与世界经济形势、全球经济发展紧密联系、息息相关。全球化还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人类不仅利益相关，而且命运与共。

第三，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既要坚持国家主权又要进行权力部分让渡的关系。民族—国家权力一直是一国独占的、排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全力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是世界各国及其执政党有史以来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和首要任务，而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国家、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部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页。

分地向合法性的全球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机构、部门让渡，一国独占的、私有的部分公共权力必须与相关的区域性组织、国际性组织以及跨国集团实行分享、共享。

第四，中国共产党如何把握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同质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习俗和精神的长期积淀，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历史赋予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而在经济全球化的直接作用下，在科技、信息全球化的现实条件下，不同民族、不同类型、不同特质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嵌入，又相互碰撞、相互竞争。这里既有表现人类共性特征和共同要求的同质性文化，又有表现为鲜明的民族个性和特色的多样性异质文化，其中也不乏文化原教旨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第五，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好单极与多极，帝国主义与和平发展的关系。争夺霸权、谋求单极主宰世界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条基本线索。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应当是多极化乃至无极化，世界各国应当是“地球村”平等的一员。然而世界上的两极霸权格局的终极，是以苏联一极的坍塌为标志的，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美国单极主宰世界的局面。历史表明，单极世界格局是霸权主义的同义语，它不仅不会带来世界和平与稳定，相反，是制造战争和世界动荡的根源。现实的全球化时代，单极与多极、霸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较量、斗争将是长期的、激烈的。

面对全球化给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一系列崭新的时代课题，党能否主动顺应客观全球化时代趋势，正确把握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有效驾驭时代发展潮流，妥善处理好民族—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共同利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全球主义的关系，做到审时度势、内外兼顾、趋利避害，势必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因而对党的执政能力是一场严

峻的考验。鉴于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这就深刻揭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时代紧迫性。

（二）全球化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

正如任何事物都不只有单面性一样，全球化在给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为中国共产党在更宽领域和更大范围内锤炼执政能力、展示执政形象、施展执政本领、实现执政价值提供了新的契机。它总体上体现在实践和思想理论两个层面。

全球化首先是一个“实践话题”。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及其执政党有过世界殖民和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历史，曾经是世界历史或者说历史上的全球化进程的主宰者。它们在推动世界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国家长期的贫富分化，甚至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20世纪后期，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苏东剧变，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冷战的终结和两个“平行世界”的消失，无疑有利于国家平等、人民民主、人类和平以及全球市场的出现，从而开辟了全球化发展的新时代。但美国等西方大国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历史形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在实践中企图操纵全球化进程，竭力维护自身的利益，积极谋求建立单极世界和新的世界霸权。这严重违背了世界人民的意愿和全球化的时代要求，理应遭到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世界各地爆发的反“全球化”浪潮日趋高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对其中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竞争主义”，反对其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而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出发，主动顺应全球化时代条件 and 实践发展，积极参与、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积极加入世贸组织，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的广泛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双边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并先后签署了《国际人权和公民权利公约》、《经济、文化及社会权利国际公约》等。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化潮流面前并不是被动应战、消极无为，更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抓住机遇、顺势而上、因势利导、趋利避祸。中国执政党为“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努力建立适应各国发展水平和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充分尊重各国文明发展的多样性”，^①支持各国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正确引导全球化朝着公正、合理和健康的方向前进，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良好的执政形象和高超的执政本领。

全球化还是一个深邃的“思想话题”。我们知道，现实的全球化不仅在实践中西方大国是主角，而且在理论上西方社会也处于先锋地位。新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全球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化实践的理论基础，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右翼学派）把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把全球资本主义化描述为全球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是人类历史的“自然状态”和“终极状态”。但是，正如西方一些左翼学者所揭示的那样，全球资本主义化的本质特征是赌场资本主义、涡轮资本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这种带有浓重的西方大国的历史劣迹和主观人为的新鲜疤痕的全球化现实和趋势，显然不是人类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期望和需要的全球化。因此，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全球化的后发国家和世界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及其执政党，面对西方社会的强势全球化理论，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必要，从坚决维护自身权益和各国人民共同权益的需要出发，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创立并倡导具有“全球性”的全球化理论和全球规制；在各种全球化话语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清思路，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26页。

加强理论创新和制度安排,科学设计和规划未来,力争赢得全球化话语主动权,以抵制西方全球化“话语霸权”,正确引导全球化发展。而理论创新、思想建设的能力原本就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为中国执政党培育、铸造理论创新的能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它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具有宽广的眼界、辩证的思维,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科学把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本质要求,把战略与策略统一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全球化发展结合起来,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以构建科学、合理、公正的全球化理论。这既是有效应对西方全球化理论挑战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全球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迫切需要。

总之,全球化为中国共产党广泛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了新的平台,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添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中国共产党在更为广阔的实践领域提升执政能力,实现执政价值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三) 全球化赋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新的时代内涵

全球化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而且广泛、深刻地作用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各个方面,赋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新的内涵。所谓执政能力,简言之,就是执政党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下治国理政的技能和本领。执政能力不仅与执政环境有关,而且全面渗透和具体体现在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素质、执政方式、执政体制和机制、执政任务等方面。

从全球化视域看,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不断深化对时代条件和时代特征的认识,积极适应执政环境的变化,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能力;就是党确立适应全球化现实和未来的,具有全球性、科学性、前瞻性、指导性的执政理念的能力;就是党整合执政资源,增强执政的国内国际合法性,夯实执政基础

的能力；就是党提升全球化时代条件下的执政意识，提高执政素质的能力；就是执政党掌握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和具有现代性的执政方式的能力；就是执政党建立和健全有效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能力；就是执政党实现全球化条件下执政任务和执政使命的能力。概言之，党的执政能力就是执政党适应执政环境的全球性变化、把握全球化发展趋势、驾驭全球化时代潮流的能力。具体而言：

——全球化要求中国共产党转变思维方式、变革执政理念。全球化时代条件 and 实践发展使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方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由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和步入全球化进程的党。党执政的时代条件、历史方位和实践基础的重要变化，内在要求党的执政理念与之相适应。执政理念蕴涵在执政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体现在执政党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上。执政理念指导执政实践。全球化不仅要求中国共产党转变思维方式，重新审视其传统的本质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要确立适应全球化形势的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和社会治理观等新的执政理念，使党的执政理念具有科学性、前瞻性、指导性。

——全球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夯实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基础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内容，稳固的执政基础是党的执政能力强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具有较好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合法性基础。全球化使其传统的执政基础部分地遭到质疑和削弱，面临着某些新的合法性危机。如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滞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不适应，基层党组织设置不科学、功能弱化，新生长的经济社会组织中党组织不完善等。为此，执政党在新的环境、形势和任务面前，必须加快理论、制度、体制的创新，整合原有执政资源，获取新的执政资源，提高执政绩效，增强执政合

法性，以不断巩固执政基础。这里的“合法性”，既包括合乎国际性的法律制度，又包括世界各国及全球公民社会的认同。

——全球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素质。执政党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时代条件和党的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对执政党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西方社会主导的、带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化实践和全球化就是“西化”、“资化”的社会思潮，中国执政党必须增强党性和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素养；在全球法制不健全，而全球新自由主义肆虐、全球“竞争主义”鼓噪的情况下，全球性伦理道德建设在全球化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站在全球化的时代高度，加强伦理道德建设，提高思想素质，是积极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举措；在全球化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时代”、“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趋势面前，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文化素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又一必然要求。

——全球化要求中国共产党转变工作作风、改进执政方式。掌握适应全球化发展要求和具有现代性的执政方式是全球化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科学化、信息化、高效化、民主化、法制化是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中国执政党顺应全球化形势和要求，在执政方式上的重要转换。科学执政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的执政理念和科学的执政手段；民主执政必须有民主的思想、民主的作风和民主的制度。依法执政，首先要有健全和完善的，与国际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及其体系，既要依照中国的法律制度，又要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来执政。

——全球化要求中国共产党改革和完善执政体制、创新工作机制。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强弱，不仅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基础、执政素质、执政方式等内在联系，而且与执政党的组织结构、执政体制以及工作、运行机制密不可分。没有好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执政党要想驾驭时代潮流

或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革新原有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完善和激活人才机制,创建各种应急预案机制和风险机制,建立新的执政资源整合机制。只有领导体制科学、工作机制高效、人才机制灵活、风险机制完善、整合机制强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才有“根本性”的保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化挑战,主动适应全球化形势及其趋势。

——全球化要求中国共产党明确执政任务、科学进行工作部署。执政任务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综合体现。明确可行的工作部署是实现执政任务的保障。全球化的时代条件 and 实践基础一方面规定着党的执政任务的基本内容,一方面客观反映了新的形势任务对执政党的新要求。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一个时期,党执政的一个重要历史性使命就是带领全国人民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争取和把握主动权,从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它不单体现在执政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方面,还具体体现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之中。

执政理念的革新、执政基础的稳固、执政素质的提高、执政方式的创新,执政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完善,最终要通过执政任务的实现体现出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既是全球化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神圣的历史使命。

二、文 献 综 述

(一) 国内全球化理论研究概述

1. 国内全球化理论研究的进程及特点

西方世界首先兴起的全球化思潮,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传入我国,并迅速对我国学界产生影响,有着特定的时代

背景。它大体上经历了全球化理论研究先行者的积极倡导和进行基础性理论研究的准备、政府重视和科研出版机构推动的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开始、全球化理论研究蓬勃兴起和快速发展这样几个阶段。具体而言：

第一阶段：中共十四大召开——1996年，是全球化问题研究的倡导及其基础性理论研究阶段。西方社会的全球化思潮之所以能够迅速传入我国，这得益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所形成的客观环境；适逢我国正式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形势鼓舞；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社会对现代化道路的理论 and 现实的反思及其引发的关于人类环境、资源、气候、生态、人口、伦理等全球性问题理论研究成果的翻译引进和我国部分学者对该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则奠定了全球化理论在我国传播的思想、学术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有关全球化方面的文献就开始在我国传播，如，1981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争取世界的生存》、1985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英〕汤因比和〔日〕池田大作合著的《展望二十一世纪》、1988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池田大作和〔意〕奥锐里欧·贝恰合著的《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展望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意〕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田志力主编《全球开放论》（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等。199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邀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来华系统介绍西方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德里克教授的演讲稿稍后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创刊号上，并立刻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被认为是第一次用中文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系统介绍”^①。一些敏感的中国学者对此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一方面陆续介绍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观点，另一方面提醒中国

^① 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学者应当对此及早进行研究。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可以说是我国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地源地和主阵地。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南开大学蔡拓教授等被认为是国内最早倡导全球化研究并身体力行的著名学者。李先生早在1991年和1992年召开的中国拉美学会纪念哥伦布远航美洲500周年的两次会议上就提出全球化时代业已开始。此后在《战略与管理》、《太平洋学报》等杂志上著文倡导进行全球化研究。蔡教授于1993年主持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全球问题”研究,“是国内较早提出系统研究全球化问题、树立全球意识的学者”^①。此外,庞中英、陆亨俊、童大林、黄平、王逸舟、李惠国等也是国内较早进行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在学术专著方面,除蔡拓等的《当代全球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外,对于全球化基础性理论——全球性问题研究的专著,主要还有倪世雄的《战争与道义:核伦理学的兴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伟主笔的《生存与发展:地球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余谋昌和王兴成的《全球研究及其哲学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卢凤的《人类的家园——现代文化矛盾的哲学反思》(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我国对全球性问题研究的学者不多,成果较少,但他们的艰辛探索和基础性工作,为国外全球化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

第二阶段:1997—2000年,是国内学者对国外全球化理论的大量翻译、传播和研习阶段,是我国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正式开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有力推动了国内学者及政策分析家对全球化的深入研究。这时起,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日渐增多,有关国外全球化理论的代表性观点有选择地翻译出版。1998

^① 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全面反映国内外学者最新成果的“全球化论丛”：《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等。虽然该丛书大部分内容介绍的是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大多数作品都是对全球化问题的一般性论述，但它的出版对国内全球化问题研究热的到来无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此外，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译著还有1997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的〔美〕E. 拉兹洛《决定命运的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孔汉思、库舍尔编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芭芭拉·沃特等著的《只有一个地球》及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汉斯—彼得·马丁等著，1998年版）、《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里斯本小组，2000年版）、《经济全球化》（〔法〕雅克·阿达，2000年版），改革出版社出版的《不要惧怕经济全球化》（〔德〕奥斯卡·拉封丹，2000年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的十大谎言》（〔德〕格力德·博克斯贝格，2000年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乔治·洛奇，1998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美〕罗兰·罗伯森著，2000年版）等。这期间我国学者对全球性问题和危机的认识有所深化，出现了尹希成等的《全球问题与中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郝永平和冯鹏志的《地球告急》（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熊飞和樊海林的《地球大村落》（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苏长和的《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新的学术成果。2000年，中国人世在即，一些科研院所、重点高校和新闻媒体纷纷就加入世贸、融入全球化问题进行专题研讨。总的看来，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出版机构的推动，加快了学界全球化理论研究热到来的